

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日期考

周学军

〔摘要〕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公举哲布尊丹巴八世为“额真汗”。至于其登极日期,国内外史学界大致有“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1911年12月16日”、“1911年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1911年12月29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2年2月15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日(1912年2月18日)”等六种观点。本文认为,其登极的确切日期应为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

〔关键词〕哲布尊丹巴八世;俄历纪年;公历纪年;蒙历纪年;农历纪年

〔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1-0048-07

1911年12月1日,库伦分裂集团驱逐清政府末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布外蒙脱离中国独立。旋公举外蒙古黄教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1870—1924)为“额真汗”(Ezen Khaan,意为“多人公举之日光皇帝”),成立“大蒙古国政府”。诚如中华民国首任都护使克库伦办事大员陈葆1916年12月9日云:“外蒙独立,为中蒙关系二百余年来最大变迁之关键……中蒙地势悬绝,华官被逐后,交通悉断者四年有余。当局之人,狼狈出走。鉴于措施之失败,复讳莫如深,致经过之真相,世所未知之者。予莅库以来(1915年10月25日凌晨,陈葆抵库就任——引者注),从事调查,殊大不易。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1〕}加之“外蒙并无公布之官报,又无刊行之公牒”^{〔2〕},乃至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的具体日期,一直是未能解决的问题。

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

关于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的日期,国内外史学界颇有歧异,大致有以下六种观点,兹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 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即1911年11月29日)。此说源于曾充前清库伦办事大臣衙门

〔收稿日期〕1999-08-04

〔作者简介〕周学军,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党史政工教研室讲师。

慕僚(已候候选府经历)、时任都护使兼充库伦办事大员公署主事的梁鹤年,1916年底为首任都护使兼充库伦办事大员陈慕口述《库伦独立始末记》一文:“是年(宣统三年——引者注)十月初九日,哲布尊丹巴八世呼图克图,行登极礼,同其妻额尔多(德)尼,诣北庙受贺。哲布尊冠赭纓黄冠,御绣龙黄袍,莅黄幢,登宝座。宣布独立,称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3]陈慕祖1926年出版的资料汇编性质的《外蒙古近世史》一书亦全文照录该说^[4]。

2. 1911年12月16日。国内外持此说者颇众,凡与12月28日一说平分秋色,均或谓哲布尊丹巴于是日登极,或云此日组织“大蒙古国政府”,然论者均未指明此说何由而来。^[5]

3. 1911年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迄今的国内外学术界,此说最为流行,所据史料亦似最为可靠,故持该说的学术论著最多^[6]。一些通俗历史读物亦持同样观点^[7]。

4. 1911年12月29日。此说主要是西方学者的观点。托马斯·尤因在《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一文中云:“1911年12月29日,蒙古喇嘛教的大教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一个充满符咒和神怪偶像的仪式中,登上了一个新的大蒙古国‘神圣皇帝’(博克多汗)的宝座”,^[8]“12月1日,库伦临时政府(指1911年11月初成立的以土谢图汗部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索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引者注)发布通告,宣布清朝政府统治的结束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神权国家的建立。12月29日,呼图克图登极,就任为一个新的蒙古国的‘神圣皇帝’”。^[9]美籍著名蒙古史学家、英国利兹大学蒙古研究项目的主持人乌尔干奇·奥农(又译昂农)1979年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访学,从蒙古国家档案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搜集了大量的、即使苏联和蒙古的历史学家亦鲜少充分利用的原始档案,并译成英文。正如奥农所说:“1911—1919年间,北部蒙古人与南部蒙古来往的官方文件多达数百份。蒙古的历史学家们迄今尚未利用那些资料撰写一部针对这一时期的专著,他们只是在其它著作中的这里或那里摘引那些文件中的几行或几页而已”。^[10]1989年他与德里克·普里查特合著的《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一书详细论证了该观点,堪称此说的代表作。^[11]此外,奥农编译的《二十世纪的蒙古英雄》亦持此说^[12]。据笔者所知,中国史学界持此说者惟有丁名楠先生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一书,以及谭剑峰先生1982年发表的《1907—1915年间沙俄对外蒙的侵略》一文^[13]。

5. 宣统三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1912年2月15日)。此说主要是我国台湾省研究蒙古问题的著名学者李毓澂先生的观点,他在《外蒙古撤治问题》一书中认为:“(宣统三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14]其论文集《蒙事论丛》亦云:“清廷所派驻扎库伦大臣(指三多——引者注)被逐后,外蒙正式宣布独立,成立政权,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登基,年号‘共戴’,称‘大蒙古国’”。^[15]李先生《外蒙政教制度考》一书亦云:“三多被迫离蒙后,外蒙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伪政权,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民国2月15日——作者原注)哲布尊丹巴登基,年号共戴”。^[16]1919年11月外蒙撤治的关键人物、人称“小徐”的民初政要徐树铮之子徐道邻先生的《民国徐又铮树铮先生年谱》亦援引此说^[17]。据笔者所知,中国大陆学术界惟有程道德先生《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年》持此说:“1912年2月15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组织‘大蒙古国’”^[18]。

6. 壬子年正月初一日(1912年2月18日)。此说仅见清末曾任库伦兵备处总办的唐在礼1912年11月与唐在章合著《蒙古风云录》一书:“壬子年正月初一日,活佛行登极典礼。”^[19]

二、第一、五、六种译说之辨伪

从以上六种观点可以看出,国内外对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的日期颇有歧异。事实上,惟有第四种观点,即1911年12月29日一说为确。其余五种误说中,第一、五、六种或系笔舌之误,抑或道听途说之辞,均殊无理由。兹分别证伪之。

1.“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一说实无可能。因为1911年12月1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乙巳),库伦分裂集团才向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出最后通牒,宣告外蒙古独立,勒令其率官员人等退出蒙境,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日期绝无可能在此之前。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一文,系据时间顺序所著,此前的日期为“十月初十日”至“十月十五日”^[20],在此之后的日期自不会是“十月初九日”,显系“十一月初九日”之误。

2.“宣统三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1912年2月15日)之说,亦难经推敲。早在公历1912年1月21日(俄历1月8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新到任之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吕巴(1912年1月上旬吕巴到任)业已致函俄国财政部官员、著名蒙古学家弗拉迪斯拉夫·卢德维戈维奇·柯特维奇,将其搜集到的有关哲布尊丹巴登极仪式的照片寄回:“他们说,当时拥挤不堪,人群开始骚动,王公和喇嘛们一直包围着他们的君主(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登极之时,吕巴尚未到任,仍由拉多夫斯基代理驻库伦领事——引者注)。正因为如此,摄影师们——有三名热心的摄影师——均未能拍摄下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21]2月4日(俄历1月22日),他再次致函柯特维奇:“很不幸运的是,这里的摄影者们均未能拍摄到最令人感兴趣的时刻——呼图克图一行走向大殿登极的时刻。当时有风,尘土飞扬,人群向里边拥挤,喇嘛和王公们在呼图克图身边围成了一个严密的圆圈,所拍摄的照片看起来不过是一大片面孔和人群而已”。^[22]可见,早在1912年1月21日前就已举行了登极仪式。李毓澍先生百密一疏,其本意显系公历1911年12月28日。“阴历”一词,当系衍语。

3.“壬子年正月初一日(1912年2月18日)”之说,亦属谬误,其理由可见吕巴上述二函。虽然唐在礼作为兵备处总办在库伦生活了10个多月(1911年1月17日到任)^[23],对外蒙事务有所了解,但在外蒙“独立”前夕的1911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五日己亥),唐在礼及家眷业已起程离库返京^[24],对此后情形并未身临其境。至其《蒙古风云录》的成书,自云乃系“同僚诸友,事后归来,目击既真,口述毕肖。更有在留商人,时以邮筒相寄,因辑成编”^[25]。

三、俄历与公历、蒙历与农历之区别

由于以上三种论断谬误之处颇为明显,故而流传不广。惟第二种观点“1911年12月16日”以及第三种观点“1911年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几成公认之事实。此二谬说何以众多学者接受,乃至无人质疑之地步,仅因确有可靠史料为凭。惟令人遗憾者,此二误说将史料信手拈来,未加辨析而已。大量可靠史料证实: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的确切日期,应为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至于迄今在国内外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1911年12月16日”和“1911年12月28日”二说,均系运用史料不当所致。“1911年12月16日”一说,系对俄历与公历纪年未加区分而来,误将俄历12月16日(公历12月29日)当作公历12月16日。“1911年12月28日”一说,则系对农历与蒙历纪年之别未加考虑所致,误将蒙历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十一月初十日癸酉,公历1911年12月29日)当作农历宣统三年十

一月初九日壬申(1911年12月28日)。

众所周知,公元前46年,古罗马统帅儒略·恺撒制定了“儒略历”,奥古斯都曾予改进。但儒略历历年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积累至16世纪末年,春分日从3月21日提前到了3月11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582年10月4日,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对儒略历加以改革,以次日(即儒略历的10月5日)为10月15日。为了避免以后积累误差,置闰的法则以公元纪年为标准;能够被4除尽的年份为闰年,但逢百之年则只有能够被400除尽的方为闰年,闰年的2月增加一日(为29日)。此即嗣后为西欧国家通用的“格里高利历”(公历)。但俄国仍沿用古老的儒略历(俄国称俄历),嗣后俄历先后较公历晚11、12天,1900年3月以后则晚13天。直到1918年2月14日,苏俄才最终放弃俄历,改行公历纪年。此系历史常识,只要略加注意可避免讹误。惟蒙历与农历纪年之别,史学界鲜少觉察和注意。

蒙古族很早就有自己的历法纪年。然而,有清一代以及外蒙第一次独立(1911年12月1日—1915年6月9日)和自治时期(1915年6月9日—1919年11月22日),外蒙古使用的并非自身早期的蒙历纪年,而是藏历纪年。由于藏历纪年与蒙古族传统的历法颇为相似,故而明末以降,随着宗喀巴创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广泛传播,喀尔喀蒙古地区逐步采用了藏历。迄今为止,蒙古国民间仍使用此种历法。唯一的区别在于,蒙古语“金”和“铁”是不分的,时常以“铁”代替藏语的“金”字而已。蒙(藏)历纪年与农历大致相符,然又时常有一日或一个月左右之差。产生此种差别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是蒙(藏)历有逢吉日延长一、二日,遇凶日则消除之习俗,农历则无此俗。公历1916年2月3日为农历丙辰年春节,而2月4日方为蒙(藏)历正月初一。中华民国第一任都护使克伦伦办事大员陈嘉,在1916年2月4日《驻扎库伦日记》中对此解释云:“蒙古向来习用旧历,如《蒙古秘史》各书所载之马儿年、羊儿年等,即午年、未年之俗称。蒙古本有管理历数之官,名为卓罗海大庆。司其事者,为西藏喇嘛教人。将我国旧历,以宗教迷信关系,另行编定。凡遇吉日,可将此日任意延长一、两日。例如,某月十五日为吉日,则次日仍为十五日,以此递推。如遇凶日,可将此日消除,例如,某月十五日为凶日,则十四之翌日即为十六。经此一番更改,岁时伏腊,辄与中国旧历,相差一、两日不等。此所以昨日为我国旧历元旦(即春节,下同——引者注),而蒙历之元旦,反在今日。此种历数,蒙藏通用”。^[20]陈嘉乃著名外交家,熟谙蒙事,1914年9月—1915年6月曾充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中方两专使之一。在都护使兼克伦伦办事大员任内,进一步“从事调查”,搜集蒙古文献资料。陈氏此种解释虽未必是1916年蒙(藏)历与农历春节之差的准确原因,然其所云蒙(藏)历此俗,当非空穴来风。

蒙(藏)历与农历纪年差别的第二种情况是,置闰年份和置何月为闰月,蒙(藏)历与农历不尽相同,从1980—1999年农历春节与蒙(藏)历春节的日期之差,即可得到证实,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复对照。第三种差别是,虽然蒙(藏)历与农历的大月和小月均分别为30日和29日,但大小月所在月份时有差别。最后一种可能出现的差别是,蒙(藏)历大小月似为相间排列(待考),而农历的大、小月排列并无规律可循,时常出现两个大月或小月相连的现象。以上四种情况造成了蒙(藏)历与农历纪年偶尔相符,然时常出现一日、甚或一个月左右之差。

兹将四种历法有关公历1911年12月的几个关键日期对照如下:

公 历	俄 历	蒙 历	农 历
12月1日	11月18日	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一日乙巳
12月19日	12月6日	十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九日癸亥
12月20日	12月7日	十月三十日	十一月初一日甲子
12月21日	12月8日	十一月初一日	十一月初二日乙丑
12月28日	12月15日	十一月初八日	十一月初九日壬申
12月29日	12月16日	十一月初九日	十一月初十日癸酉

从以上对照表中可以看出,1911年12月1日,库伦集团宣布外蒙古独立之时,蒙历、农历均为十月十一日。然因农历十月为小月(29天),而蒙(藏)历十月为大月(30天),故而十月底以后,蒙(藏)历历年较农历晚一日。这一差别迄今尚未被学术界觉察,误将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的日期——蒙历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十一月初十日癸酉,公历12月29日),当作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壬申(12月28日)。

四、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的真实日期

1911年12月1日,库伦分裂集团宣告外蒙独立建国,公举哲布尊丹巴八世为“额真汗”。旋经喇嘛占卜,确定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仲冬月(十一月)初九日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为登极的良辰吉日,^[27]1911年12月11日(俄历11月28日),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多夫斯基在致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科扎科夫的第1166号报告中说:“拟于12月16(29)日宣布活佛为喀尔喀皇帝。”^[28]公历1911年12月13日,在库伦集会的王公、喇嘛向喀尔喀四部副将军、堪布诺们罕(彭楚克)和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发布通令:“我们业已宣布将在(仲冬月)阴历初九日共举博克多格根为大汗”。^[29]哲布尊丹巴八世预定的登极日期,清政府事先亦有所闻。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甲子(公历1911年12月20日),驻俄公使陆征祥致电外务部云:“探闻呼图克图拟本月初十日称王,并有陈请事件,届时派人来俄。”^[30]此处所说的“本月初十日”,即是指农历而言。但当时滞留在外蒙的官商人等,对蒙历与农历之别未加考虑,即电告内地。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乙丑(公历1911年12月21日),库伦电报局委员顾保恒致电邮传部和内阁云:“活佛狂悖如故,拟本月初九日伪窃,勒人庆贺。”^[31]农历十一月初五日(公历12月24日),程大业自买卖城(恰克图)致电邮传部云:“蒙官传谕商华:‘本月初九日活佛登宝,凡属蒙界均著悬彩,备礼庆贺’。”^[32]此二电所云“本月初九日”,系指蒙历十一月初九日而言,亦即农历十一月初十日癸酉。然后人不察,误作农历十一月初九日壬申,遂有1911年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之谬说。

那么,哲布尊丹巴八世是否按照预定日期登极的呢?1911年12月30日(即哲布尊丹巴登极的次日),库伦当局的内务部致财政部、外务部、陆军部、司法部、喀尔喀四部副将军、库伦的堪布诺们罕(彭楚克)和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的公函云:“共戴元年仲冬月初九日,在共举如日光辉、如大汗(似指成吉思汗——引者注)一般万寿的瓦齐尔达喇博克多格根登宝座行使政教权力之后,他发布了弘扬佛教、普渡众生的圣谕”。^[33]1912年2月2日(俄历1月20日),内务部司官、辅国公海山致函柯特维奇亦云,1911年“12月16日(此系俄历,公历为12月29日。海山、车林齐密特和杭达多尔济等人与俄国人的通信日期向署俄历——引者注),博克

多格根被宣布为蒙古大汗”。^[34]外蒙独立后，煽动呼伦贝尔地区的总管胜福、车和扎、成德等王公1912年1月中旬叛乱。2月中旬，胜福、车和扎等人派达木丁苏伦、盖哈苏赴库伦，致内务大臣、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①的复函亦云：“您通过特别信使送来的一份官方文件，我们业已收悉。所闻博克多于仲冬月初九日登极，我们衷心为他祈祷”。^[35]可见，哲布尊丹巴八世的确是按照预定日期，即公历1911年12月29日登极的。

【参 考 文 献】

- [1][26]陈集. 蒙事随笔(第二种)[M]. 驻扎库伦日记(卷二)[M]. 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 152, 103.
- [2]陈集. 蒙事随笔(第二种)[M]. 驻扎库伦日记(卷三)[M]. 187.
- [3]梁鹤年. 库伦独立始末记[J]. 载陈集. 蒙事随笔(第二种)[M]. 驻扎库伦日记(卷二)[M]. 162.
- [4]陈泰祖. 独立时期之外蒙古[J]. 外蒙古近世史(第一篇)[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13.
- [5]苏联科学院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著.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M]. 北京出版社汉译本, 1958, 218. 李新、李宗一主编.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M].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205. [蒙古]乔巴山著, 张惠卿译. 蒙古人民革命简史[M]. 世界知识社汉译本, 1956, 5—6. 戴维·达林. 俄国在亚洲的崛起[M]. 1949, 126. 戴逸主编. 中国近代史通鉴, 1940—1949[M]. (第6卷)民国初年. 红旗出版社, 20. 胡绳武、金冲及主编. 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M]. 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420. 石源华. 中华民国外交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97.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蒙古族通史(下册)[M]. 民族出版社, 1991, 1109.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沙俄侵华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522. 郑汕、傅元祥主编. 中国近代边防史, 1840—1919[M].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409. 王启民等. 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3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大事记(第一辑)[M]. 征求意见稿.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25. 张宏儒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M]. 北京出版社, 1993, 46. 程栋、刘树勇、张卫编. 旧中国大博览, 1900—1949[M]. 科学普及出版社, 230. 二十世纪中国实录[M].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522. 吴富恒主编. 外国大事典[M].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3, 982—983. 丁惠永主编. 中国百年大写真[M].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39. 梁采花. 北洋政府与外蒙撤治述论(1915—1919)[J]. 安徽史学, 1997(4), 64.
- [6]余绳武主编. 沙俄侵华史(第4卷, 下册)[M]. 人民出版社, 1992, 740. 蒙古简史.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325. 郭廷以编著.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1448—1449. 郭廷以. 俄帝侵略中国简史[M].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38. 周谷城名誉主编, 马勇、王和主编. 世界历史全鉴[M].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1864. 吴东之主编. 中国外交史(第2册)[M]. 中华民国时期.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18. 王希隆. 中俄关系史略, 1917年前[M].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345. [美国]马士、恽亨利合著, 姚曾舜等译. 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本, 1975, 539. [美国]罗伯特·沃登、安德鲁·玛特勒斯·萨瓦达合编. 蒙古国家研究[M]. 1991, 36. 孙福坤. 蒙古简史新编.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57. 陈春生. 苏俄对外蒙古独立之关系[J].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3编, 下册)[M].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七十五年九月, 752. 张大军. 外蒙古现代史(第1册)[M]. 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46. 丁中江. 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373. 张启雄. 外蒙主权归属文涉, 1911—1916年[M]. 台湾:中央

① 学界历来谓内意大臣车林齐密特为库伦商卓巴特衙门的达喇嘛, 似不确, 应为副达喇嘛(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一文作“二达喇嘛”)。据末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于登曾一案来文致抗, 潜指诉革片》, 以及宣统三年閏六月十五日《已革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报效巨款, 请赏还原衔、原职折》云, 清末库伦商卓特巴衙门的达喇嘛系达什札布, 而车林齐密特为副达喇嘛。见《三多库伦奏稿》, 详见马大正、鹿崇德主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选粹》, 第345、413页。

-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四年十一月, 36—37. 张启雄, “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J], 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M], 民国八十年六月(20), 263. 吕一燃, 沙俄与一九一一年外蒙古“独立”[J], 西北史地, 1987(3), 102. 白拉都格其, 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J], 载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284. [美国]E·T·威廉斯, 中国、俄国和蒙古之间的关系[J], 美国国际法杂志, 1916(10), 803. 转引自张启雄, 外蒙主权归属交涉, 1911—1916年[M], 333. 蔡翔、孔一龙主编, 20世纪中国通鉴(第一册)[M], 改革出版社, 333.
- [7]司马图强编著, 列强瓜分中国纪实[M],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187—188. 师博主编, 外蒙古独立内幕[M], 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3, 130.
- [8][9]托马斯·尤因, 中国边境上的事件: 1911的外蒙古[J], 原文载西德, 亚洲历史杂志, 1978(2). 汉译文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146, 161.
- [10][11][21][22][27][29][33][34][35]乌尔干奇·奥农、德里克·普里察特合著, 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 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M], 荷兰莱顿英文版, 1989, 125, 15, 192, 96, 98, 15, 136, 149, 97, 153.
- [12]乌尔干奇·奥农编译, 二十世纪的蒙古英雄[M], 纽约英文版, 1976, 75.
- [13]丁名楠等,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M], 人民出版社, 1986, 418. 谭剑峰, 1907—1915年间沙俄对外蒙的侵略[J], 北京大学学报, 1982(6).
- [14]李毓澍, 外蒙古撤治问题[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民国六十五年十二月(1976年12月): 6.
- [15]李毓澍, 外蒙政教制度考[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民国六十七年六月(1978年6月): 428.
- [16]李毓澍, 蒙事论丛[M], 台北, 1990, 263—264.
- [17]徐道邻编, 民国徐又铮树铮先生年谱[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民国七十年十一月(1981. 11月): 88.
- [18]程道德编,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19)(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534.
- [19]唐在礼、唐在章, 蒙古风云录[M], (第二章)库伦独立后之活佛及女活佛, 民国元年油印本.
- [20]梁鹤年, 库伦独立始末记[J], 见陈霖, 蒙事随笔(第二种)[M], 驻扎库伦日记(卷二)[M], 159—162.
- [23]唐在礼抵达库伦, 充任库伦兵备处总办的时间, 参见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筹练新军一标派唐在礼总办片》: “兹承军署特派委日本士官学校炮工毕业生、前充近畿教练处总办、副参领唐在礼由驛前来, 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即1911年1月17日一引者注)抵库, 经臣照飭该员将兵备处即日开办, 并刊给关防文曰‘库伦兵备处总办之关防’”。见三多库伦奏稿[J], 载马大正、成崇德主编, 吴丰培整理, 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M],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375.
- [24]唐在礼离库返京的日期, 参见《宣统政纪》卷65, “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戊戌”、“十月初五日己亥”条; 唐在礼, 辛亥前后的袁世凯[J], 载吴长翼编, 八十三天皇帝梦[M],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94—97. 唐在礼、唐在章, 蒙古风云录(序言)[M].
- [25]唐在礼、唐在章, 蒙古风云录(序言)[M].
- [28]陈春华、郭兴仁、王远大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 有关中国部分1911年5月—1912年5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20.
- [30][31][32]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第7卷)[M], 296, 298, 299.

(责任编辑 葛 根)